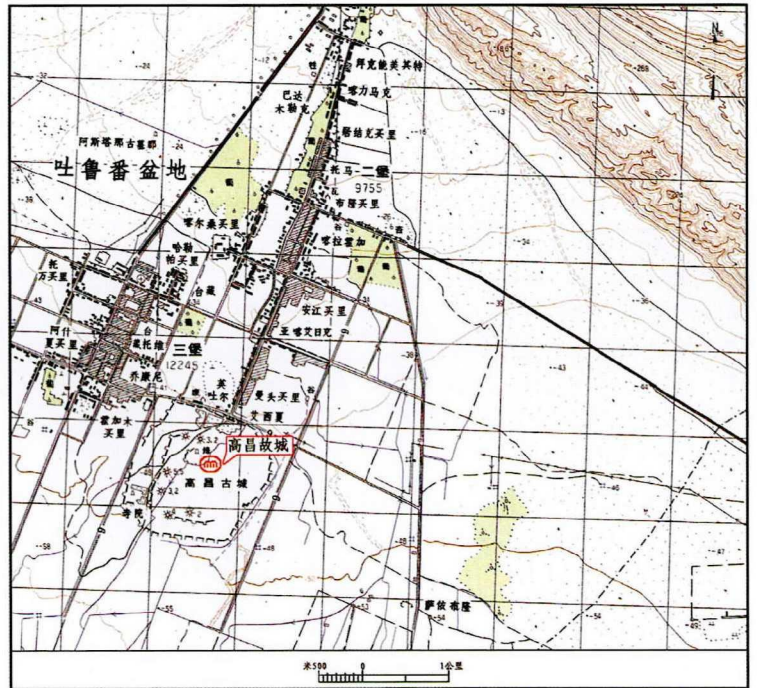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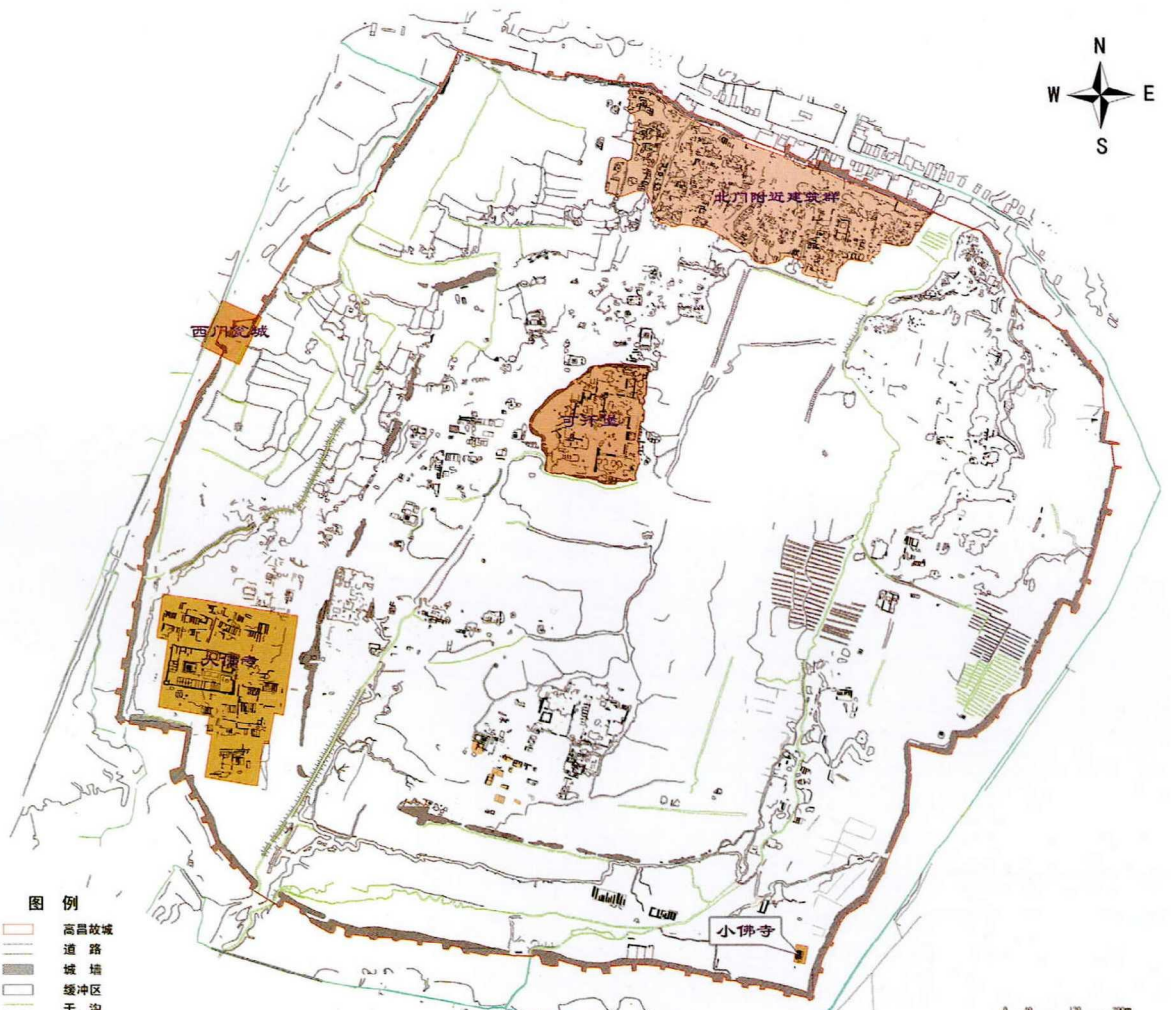


高昌故城的发现与考古研究

文 / 刘耐冬
王 龙



图一 高昌故城位置图



图二 高昌故城遗址平面图

2014年6月22日,在卡塔尔多哈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8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高昌故城作为中国、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三国联合申遗的“丝绸之路:长安—天

山廊道的路网”中的一处遗址点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高昌故城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市以东30余千米的二堡乡(图一),是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14世纪

丝绸之路东天山南麓吐鲁番盆地第一大中心城镇。故城总面积约198公顷,城址平面呈不规则方形,包括内外相套的“可汗堡”、内城和外城三重城(图二),城墙主要以夯土夯筑,发

表一 外国探险家的活动概览^[2]

时间	国别	人物	活动	备注
1897年	俄国	阿尔伯特·雷格尔 (植物学家、医生)	考察高昌故城并将其描述为“筑有很厚围墙的一大片墟址”的“一座古罗马般的城市”,他继而断言到“这是古代新疆的一个文化发达民族的建筑物”。雷格尔的文笔很一般,他对高昌故城考察后的纪实性描述并不准确也不生动,但却引起了西方学者和探险家的极大兴趣,也揭开了新疆文化考察的开端	1875年,雷格尔在被俄国占领的宁远县(今新疆伊宁)做医生。他得知天山腹地有秀美、别样的风光和植物,于是沿伊犁河、巩乃斯河谷溯源而上到达吐鲁番盆地。后写出《吐鲁番旅行报告》。在雷格尔之前进入西域的人大多以地理与自然科学为考察重点
1898年	俄国	季米特里·克列门兹	由俄国圣彼得堡科学院派到天山南部进行自然科学考察兼考古、收集文物。在吐鲁番考察和挖掘了高昌故城、阿斯塔那古墓、吐峪沟、木头沟和其他一些古代佛教遗址,收集了多件文物,并对高昌故城进行测绘、拍摄	后写出《1898年圣彼得堡皇家科学院吐鲁番考古队报告》和《吐鲁番及其古迹》一文。所获文物,至今存放在圣彼得堡艾米塔什博物馆,文书收藏在俄国科学院彼得堡分院的东方研究所
1900至1933年	英国	斯坦因 (英籍匈牙利人)	先后四次到新疆地区探险考察,1913至1914年第三次考察期间,对高昌故城进行了地形测量,挖掘活动主要集中在I、V和IV等遗迹,在柏孜克里克石窟切割的壁画装满了100多箱;在阿斯塔那发掘34座墓葬,获得大批文物	其正式报告为1928年出版的《亚洲腹地考古记》,全四卷。斯坦因从新疆带回的一部分文物和织物收藏在伦敦大英博物馆,有关吐鲁番的大部分物品收藏于新德里博物馆
1902至1914年	德国	阿尔伯特·格伦威德尔 (画家、佛教美术家、考古学家)、 勒柯克	先后四次组织考察队来新疆从事活动,三次涉及吐鲁番地区;1902年,格伦威德尔带领“皇家普鲁士吐鲁番考察队”对吐鲁番进行了第一次考察,劫走46箱文物;第二次是由勒柯克领导,在柏孜克里克、吐峪沟、胜金口等千佛洞和高昌故城内的王宫、寺庙遗址,大肆盗掘和切割壁画;1905年从吐鲁番运走了各种文字古写本、经卷、各种钱币、雕像、石刻、壁画和其他文物共计200箱;1906~1907年,格伦威德尔和勒柯克联合进行考察,共运走新疆文物128箱	运走文物包括著名的《凉王大且渠安周造寺功德碑》和《高昌主客长史造寺碑》。搜集品当中文献分藏于柏林科学院吐鲁番学研究中心和国家图书馆东方部。艺术品和一些带插图的写本藏在柏林印度艺术博物馆。格伦威德尔第一次考察回国后发表了《1902~1903年在高昌古城及其邻近地区进行考古发掘的报告》(1906年在慕尼黑出版);第三次考察回国后,又出版《中国突厥斯坦的古代佛教寺庙》(1912)
1906至1909年	法国	伯希和	考察高昌故城,获得部分文物	所获文物大都收藏在吉美博物馆,文书资料收存在巴黎图书馆的东方手卷部
1908至1912年	日本	野村荣三郎、 桔瑞超、 吉川小一郎	大谷光瑞考察队先后三次到新疆,1908~1909年第二次来时,由野村荣三郎和桔瑞超带领,在吐鲁番地区作了搜寻;1910~1912年,桔瑞超和吉川小一部分头在敦煌、吐鲁番七克台、胜金口、吐峪沟、交河故城、阿斯塔那古墓群作了挖掘,获得大量高昌王国至唐代的文书,后被称为“大谷文书”	后出版《西域考古图谱》《大谷文书集成》《新疆域记》等书。所获文物除流失的之外,其余现藏日本东京博物馆和龙谷大学、韩国汉城国立中央博物馆、中国旅顺博物馆
1909年	俄国	鄂登堡	1909~1910年,俄国圣彼得堡科学院派鄂登堡对天山南北地区进行考察,他组织第一次俄国东突厥斯坦考察队,考察发掘吐鲁番等地,对高昌故城进行过考察	所获高昌文物,现藏圣彼得堡艾米塔什博物馆

现有城门遗址，外城墙体有马面等军事附属设施。

笔者在吐鲁番工作期间，每到黄昏时分面对着这一片恢弘的残垣断壁，风拂过似乎可以听到她在娓娓讲述着经历的时移世易。作为“已逝去”的世界文化遗产地，高昌故城的艺术感染力是活生生的。明代陈诚出使西域时曾至此凭吊，在《西域番国志》中他写道：“城近北山，地势卑下，山色青红若火，天气多热，故名火州。城方十余里，风物萧条。昔日人烟虽多，僧堂佛寺过半，今皆零落。”清代纪昀、王树楠、曾炳潢

等也都到此考察过^[1]。随着发现、研究的深入，高昌故城逐渐展示出更多的面容。

一 外国探险家的活动

19世纪末20世纪初，先后有俄国、英国、德国、法国、日本等国的探险家，以科学考察为名，多次到高昌故城进行盗掘（表一）。这些外国探险家，多以寻宝为目的，他们只重视“宝贝”本身，并不重视“宝贝”的出土环境，将发现的大量珍贵文物盗走，隔断了文物与母体的联系。

二 国内学者对高昌故城的考察与研究

国内学者最早调查高昌故城的是黄文弼先生，时代为20世纪20年代末，此次调查是实地踏查和向当地居民了解遗址情况^[3]。居民口述可汗堡中发现过五铢钱是很有价值的时代信息。

1961~1965年，阎文儒先生到吐鲁番考察石窟，同时也考察了高昌故城，后来写下《吐鲁番的高昌故城》一文，影响深远。阎文儒先生认

表二 国内的调查与发掘^[1]

时间	相关工作与活动
1929年至1930年	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成员黄文弼两次到高昌故城调查
1961年	阎文儒考察高昌故城
1988年	吐鲁番地区文管所普查登记
1992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利用航空遥感成像与地面测绘结合的方法，对高昌故城进行测绘和遥感地学解译
2000年	吐鲁番地区文物局和新疆第二测绘院联合对高昌故城进行了测绘，并绘制高昌故城1:2000地形图
2002年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中国文物研究所共同完成《吐鲁番地区文物保护与旅游发展总体规划（2002~2020）》，对高昌故城的遗存、时代、现状、价值、管理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和描述
2006年	吐鲁番文物局完成高昌故城1:500平面图及城墙内、外面立面图的测量、绘制工作
2006年	为配合高昌故城维护工程，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吐鲁番地区文物局对高昌故城西门及大佛寺遗址进行了发掘，出土了部分文物
2007年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对高昌故城进行了第二次考古发掘，发掘地点有西南大佛寺东北排房和外城西面南、北两侧各200米城墙
2008年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对高昌故城进行了第三次考古发掘，发掘地点有东南小佛寺、护城河遗迹等
2008年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对高昌故城进行了第四次发掘，发掘地点有大佛寺东南排房、大佛寺北佛塔、内城西墙等3处属于第三期维修项目的遗存
2009年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组织实施了高昌故城第五次发掘，发掘地点有内城南墙南门段、一、二、三号民居、外城西墙西门南二段、重要遗迹和可汗堡遗址200平方米试掘等七处
2012年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对高昌故城北部建筑遗址区内的四号民居进行发掘清理。此次发掘面积160平方米，共发现有半地穴式房址四间，地面居址二间，周围另有半地穴式房址三至四间
2013年	为配合高昌故城申遗，拟于高昌南门处铺设木栈道。在上级主管部门的批准下，吐鲁番地区文物局组织考古工作队，由吕恩国研究员带队对高昌金福门进行工程前期的保护性发掘工作

为,高昌城可以分为外城、内城和最北面的宫城三部分。文中强调了北部的宫城。关于高昌故城的年代问题,阎先生推测是唐设西州,或以以后回鹘高昌时代所改建的。高昌故城的平面布局,宫城在北,内城在南,与唐代长安的平面布局是相似的^[4]。

20世纪90年代,侯灿先生通过实地调查,结合历史记载及前人研究成果,认为高昌城是公元4世纪初前凉在此建郡,为郡治所在。至14世纪中叶元朝末年废弃。并进一步论证了高昌城的形制布局,并认为高昌壁设在胜金口附近。除此之外,基本上因袭了阎文儒旧说^[5]。

2000年,孟凡人先生在《中亚学刊》上发表《高昌城形制初探》一文,利用国外探险家的资料,详细探讨了高昌城的形制与布局^[6]。认为高昌城的时代跨度是自汉通西域至元代。文中据《西州图经》说“可汗堡”为宫城,始建的时间大概不会晚于北凉承平三年(445),下限到高昌回鹘时期。详细论述了内外城墙和门址的位置。

此阶段的考察和研究均是以实地调查与综合文献为基础(表二)。

三 高昌故城考古发掘工作小结

自2005年至2013年,高昌故城共开展了7次考古发掘^[8](表二)。2005年,国家启动丝绸之路(新疆段)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承担了对高昌故城维修前期的文物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工作。截至目前,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共在高昌城内进行了6次发掘,吐鲁番学研究院进行了最近一次的发掘。

已开展的考古发掘工作针对性主要放在了配合高昌故城的维修保护工程,更确切地说是为了能更好地对游客开放,考古发掘工作只是配合的从属地位,旅游发展与考古研究未能完全协调。相比于一般的建设工程,高昌故城明显不同,作为留存至今的规模宏大的遗址区,又得益于本地的自然因素和人文因素,高昌故城不止有简单的旅游观光价值,更有深远的研究价值,不局限于考古学研究,而是



图三 高昌故城鸟瞰图

具有多学科的研究价值。

这一时期的考古工作重点是对宗教遗址的发掘。因吐鲁番向世界展示的文化面貌尤为突出的就是宗教文化,所以对高昌故城中的宗教场所进行了重点保护以对游客开放。第一、第二、第四次发掘都包括了西南大佛寺的发掘工作,第三次发掘了东南小佛寺。高昌城的重要价值是在这里可以看到多种宗教的融合与交流,相对而言,它的军事防御功能、行政管理功能则稍显逊色。这也许是至今尚不能确定它的始建年代和核心管理区域的部分原因。

关于高昌故城的始建年代和形制沿革,目前尚有许多问题不甚明朗。第一次考古发掘未能找到清晰的地层关系,发掘之前也没有进行城址内相对年代框架的建立,西南大佛寺虽是重点,但相关资料与高昌故城的始建年代和形制探讨几乎没有关系,西门的年代也未确定。

第二次考古发掘在外城西墙采集了4个测年标本,最早的碳十四数据是390~550年,相当于高昌郡到麴氏高昌时期。说明高昌郡时期就已经修筑了外城墙。内城墙和宫城暂无数据。其实还应在北墙、南墙、东墙取样。当然,在历史时期使用碳十四测年法会存在精度问题,比如已

有的碳十四数据时间跨度150年,在这期间,高昌故城已经几易其主。精度只有这样,但对于除了文献资料别无其它年代数据的高昌故城来说,这样的“精度”也是有意义的,可以在此范围内,在这把粗刻度尺的基础上再寻找细刻度的尺子。如果参考城北阿斯塔纳古墓的年代可以早到西晋(266~316),高昌故城似乎存在早到西晋时期的可能。

第三次考古发掘发现了护城河的遗迹,但没有确定其年代,存在遗迹是后期河道的可能。

第四次考古发掘了内城西墙,但没有探讨此墙的建筑年代,通过墙的构造判断其并不像外墙那样具有明显的防御功能,可能只是作为一种区域的隔断。据孟凡人先生的《高昌城形制初探》,内外城墙的夯层厚度相近,而且内城墙上的五座门址与外城墙上的五座门址都是对应设置的,所以很可能是同期规划的。那么内城墙和外城墙一样,也很有可能始建于高昌郡时期。又据内城墙存在的一个“打破关系”—— α 寺院嵌在内城西城墙中,内城墙被 α 寺院所打破。据孟凡人研究, α 寺院最早为唐代佛寺,那么,根据这个打破关系推理,内城墙在唐代就已失去了城墙的功能,已经废弃。所以,唐代的高昌城并非如现



图四 高昌故城老照片

在所见的“同心圆式”的三重城的形制，也许只有一个外城城圈了。

第五次考古发掘了“可汗堡”，但未解决可汗堡是否是宫城所在、可汗堡中的高塔建筑的实际功用等问题。宫城的位置有可能是“北子城”或“可汗堡”，如果宫城是“可汗堡”，也许晚到回鹘高昌时期。如依此推理，高昌故城就从未形成三重城的形制，到回鹘高昌时期也只是宫城和外城两重城的形制。如果宫城是北子城，又能够确定北子城的始建年代是唐代，那么才有可能说唐西州高昌城因循了唐长安城之形制。遗憾的是第五次考古发掘没有针对“可汗堡”周边宫城城墙进行试掘，对“可汗堡”本身的形制及可能的功能也没有探讨，而第六次发掘工作虽然选择了北子城的位置，也未针对性地解决此问题，只是发掘了四号民居。关于宫城的寻找，《管子·大匡》言“凡仕者近宫，不仕与耕者近门，工贾近市”，似乎可以有规划地寻找官署区，通过官署区来找官城。或者根据同时期如北魏洛阳永宁寺的位置，寻找皇家寺院，在皇家寺院附近寻找和确定宫城的位置。

第七次考古发掘位于高昌故城南偏门两处城墙的缺口处。自治区考古所曾于2012年4月对南偏门区域开展了两处发掘，一处位于高昌故城南偏门外城墙西端缺口处，一处位于南偏门瓮城内城墙东段缺口处。本次试掘

点位于上述两处发掘点中间的南偏门通道处。城址考古工作中，对门址的发掘固然重要，但应考虑到门址的多变性。此次发掘的门址年代可以定在唐代，但对讨论高昌故城的始建年代和形制没有大的必要性，要讨论的应是符合规制的正门，如唐长安城的朱雀门等。

由上述分析可知：高昌故城始建于高昌郡时期（327～460年），高昌故城的始建形制是包括外城、内城的二重城圈，最初的宫城位置尚不明确。

四 结语

高昌故城是吐鲁番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通过梳理它的发现和考古研究的历史，发现高昌故城最基础的问题——它的始建年代和形制尚不明确，原因是多方面的，城址考古工作有现实的困难和阻力，最主要的是地上城址本身的复杂性，相对于地下的遗址和墓葬，会缺少地层学这根拐杖，又不能对地上遗址本身进行大面积的破坏。未来还需要更多的基础研究工作来推进更可靠的比较研究和拓展联系，把这一问题研究清楚，有助于更好地连接吐鲁番、新疆乃至丝绸之路上的文化遗产，更好地呈现历史时期的丝绸之路文化交流。

（致谢：本文的基础资料得益于吐鲁番学研究院陈爱峰先生多年的积累，

不胜感激，在此致谢！）

[1] 柳方：《吐鲁番高昌故城保护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10年硕士学位论文。

[2] 同[1]。

[3] 黄文弼：《吐鲁番考古记》，中国科学院出版社，1954年。

[4] 阎文儒：《吐鲁番的高昌故城》，《文物》1962年第7、8期。

[5] 侯灿：《汉晋时期的西域戊己校尉》，《西北史地》1983年第3期；侯灿：《高昌都城址——兼及历史与文化》，载《中国古都研究（第十一辑）——中国古都学会第十一届年会论文集》，1993年。

[6] 孟凡人：《高昌城形制初探》，《中亚学刊》第五辑，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

[7] 柳方：《吐鲁番高昌故城保护研究》，并结合吐鲁番学研究院陈爱峰先生提供的资料。

[8] 历次考古发掘简报可参阅内部刊物《新疆文物》。未出简报的发掘记录由吐鲁番学研究院陈爱峰先生提供。

（责任编辑：王龙霄）

（责任校对：阮富春）